

第八章 教育机会

第一节 引言

教育机会的合理分配是确保教育公平的前提。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应该如何配置公立教育机会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择校，作为分配教育机会的手段之一，将对教育公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这类争论的焦点。一方面，教育部对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间的择校行为严厉禁止。另一方面，从小学到初中，每年都有大量的家长通过各种手段为自己的孩子择校。根据《关于上海市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调查报告》，2004年上海小学、初中新生入学时，38.60%的家长曾经为孩子择校，或成功或没成功（上海教育信息调查队，2005）。不光政府、家庭和学校三方对于择校的态度各不相同，即便在各方内部，也存在截然不同的意见。中央政府希望避免择校对社会公平的影响，部分地方政府却想通过择校弥补公共教育经费的不足；有的家庭希望多一些选择的机会，而另一些家庭却对高昂的择校费怨声载道；优势学校希望多招一些择校生，薄弱学校却不得不面对择校使生源流失的窘境（郭春发，2006；曾天山，1999；周太平，1998。）。人们基于不同的理由对择校采取了或支持或反对的态度。然而，许多理由并没有经过深入地思考和检验，因此它们很有可能是站不住脚的。不假思索地使用诸如选择自由或社会公平一类的词语往往给人误导。教育政策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人身上，因此，分析择校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找准它影响了哪些人。

是否支持择校，应该看它使哪些人获益，同时是否损害了另一些人的利益。显然，择校行为的直接受益者是进行择校的家庭。根据显示性偏好理论，只有当“择校”带来的好处大于不择校的好处时，家长才会采取这一行动。所以，研究这些家庭的特征，可以使我们了解什么样的家庭会从扩大的学校选择权中受益。如果这种获益并不会导致其他家庭的损失，那么择校就应该被支持。如果择校使另一些家庭受损，问题就会更复杂一些，需要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决定我们对择校问题应该采取的态度。总之，研究什么样的家庭倾向于利用择校机会，是对择校政策进行评价的第一步。只有找准政策所涉及的目标人群，才能增进我们对政策实施情况的了解，并解答择校是否会加剧社会阶层分化的问题，最终促进整体社会福利的提高。

本章，我们将以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为基础，使用《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的数据对影响家庭择校倾向的因素进行研究。我们将发现：在我国城镇地区的义务教育阶段，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较丰富的家庭最倾向于利用择校机会。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增长都使得家庭更倾向于利用择校机会。而经济资本的增长使家庭的择校倾向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三种资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择校决策的第一步，即是否产生择校意愿。特别地，由于政策限制，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往往是地下进行的，这使得家庭人均收入对家庭择校倾向的影响幅度很大，导致低收入阶层难以从择校中受益。因此，允许择校，为所有家庭一视同仁地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机会反而能促进教育公平。

第二节 择校的概念

对于“择校”一词的含义，有许多不同的理解。我们认为“择校”是家长为子女选择满意学校的行为。在我国现行的政策框架内，选择就读民办或民办公助/公办民助学校是被认可甚至被鼓励的，对家庭择校行为的争论更多地集中在家庭在公立学校间的选择上。因此，本章专门研究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间的择校现象。我们将“择校”定义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家长放弃政府指定的对口学校，主动选择到其它公立学校就读的现象。本章只研究家庭在我国公立学校间的选择，选择就读民办或民办公助/公办民助学校的家庭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

第三节 我国的学校选择制度

在我国的城镇地区，学校通常被划分到各个片区。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就近入学，对于学校质量差距较大的地区，执行就近入学并不能使社会满意，于是许多地区实行了“电脑派位”的做法，即通过计算机程序随机将新生分配到各个学校去。择校是对“就近入学”政策的偏离，它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 (1) 学生放弃对口学校进入另一个片区的公立学校。通常目标学校会对这类学生收取较高的学费；
- (2) 分数不足以进入目标公立学校的学生通过缴纳一定费用进入该校；
- (3) 学生选择进入民办学校，这类学校的收费通常远远高于公立学校。(Mun C. Tsang, 2001)

我国政府对于不同层次的择校行为有不同的政策。对于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就近入学”的“就近”是相对就近。由于存在着中、小学学校布局及各中学招收学生人数不同等因素影响，因此，“就近”并不是绝对指地理位置的远近，不是指哪个学生的住址离哪所中学近就叫“就近入学”；也不是指哪所小学离哪所中学近就是“就近入学”。凡是被分配到招生区域内的学校，都叫“就近入学”。

出于对教育公平问题的考虑，教育部还规定：“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招‘择校生’，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进行疏导。”整个义务教育阶段都实行“一费制”，只对借读生收取一定的借读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二章第十四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经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或乡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申请借读。”按照上述规定，在异地借读的学生为借读生。借读生和择校生的区别在于：一是目的不同——择校生是希望到办学校好的学校上学，接受较高质量的教育；借读生是为了接受义务教育，解决有学可上的问题。二是形式不同——择校生关键在择，具有主动性，即千方百计地要寻求好学校；借读生关键在借，具有被动性，由教育部门为其指定学校。三是时间不同——择校生择校的时间往往集中在秋季开学的开始；借读生借读时间却具有不确定性，学期前、学期中都有可能发生。按照国家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借读生，要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交纳一定的费用。

第四节 国内外对家庭择校行为的研究

我国对家庭择校行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文东茅副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在分析了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在公私立学校间、公立学校间以及正规教育与补课家教间的选择后，他指出，父亲教育程度低、职业地位低以及家庭人均收入低的弱

势阶层在择校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没有非农户口的家庭择校比例高，但如果是弱势阶层，即便择校也只能去质量不是太好的学校。因此，他提出应改变“强制性的就近入学”的现状，扩大弱势群体择校自由的政策建议（文东茅，2006）。

其余还有一些经验性的总结。《中国教育报》在解读收费政策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择校，大体可分为‘以钱择校’、‘以权择校’和‘以分择校’三种形式。‘以钱择校’会妨碍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以权择校’属社会不正之风；‘以分择校’会使考试更为激烈，加重学生课业负担。”这实际上概括出家长择校时可供调动的三种资源，即钱、分、权。

择校问题在国际上同样争论激烈，各方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对家庭的择校行为，不同研究的切入角度各不相同，这些角度大致可归纳为四类问题，即：哪些阶层从择校中受益？家庭在不同学校制度间怎么选择？家长的满意程度怎样？家长的偏好如何？

对于哪些家庭能够从学校选择中受益，主要观点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优势阶层能够更多地从学校选择中受益，另一派则认为弱势群体更能从择校中受益。

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表明优势阶层是学校选择的最大受益者。和文东茅的发现相似，Hsieh等人（2003）对智利的研究表明，择校会加大社会分化：来自有利家庭背景的学生在获得择校机会后更可能离开原来的公立学校进入私立学校，从而使公私立学校间学生家庭背景的差距加大。

同样，在一项早期研究中，Vernon C. Pohlmann（1956）对能力、社会经济地位和中学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发现，无论男孩女孩，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比孩子能力更能影响他们所就读的学校类型。一个例外是，对于女孩，在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之间选择时，能力是比地位更大的影响因素。作者认为，这表明教育在促进社会等级流动方面作用有限。

Philip Q. Yang和Nihan Kayaardi（2004）研究了家长选择非公立学校的决定因素。他们发现，在父母对教会学校（religious school）的选择中，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地位、年龄、出生地、家庭子女数目、地区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种族、性别、居住地以及家庭结构因素无明显作用；而在父母对非宗教私立学校（non-religious private school）的选择中，社会经济地位是决定其选择的关键因素。在父母的学校选择中，他们发现了明显的阶层差别，但种族差别并不明显。这些发现表明：学校选择的结果会加剧阶层的分化，但不必担忧会加大种族隔离的程度。

此外，Epple等人（1998）对美国的研究表明，随着收入和孩子能力的增加，家庭选择私立学校的倾向越强。在私立学校中，选择高学费学校的倾向也会随家庭收入和孩子能力的增加而增加。在私立学校，学费随孩子能力增加而减少，甚至有相当部分的高收入家庭只交很少甚至不交学费。在公立学校，家庭收入和孩子能力的相关关系更强。模型分析表明：当公立学校的花费下降时，家庭收入和孩子能力对私立学校入学率的影响更大。当公立学校花费上升时，低质量私立学校因孩子能力而减免学费的比例会下降，而高质量私立学校几乎不受此影响。此外，私立学校的花费会随公立学校花费的上升而上升。

然而，也有相当多的研究证实弱势群体更倾向于利用择校机会。Schneider等人（1996）对1988年国家教育跟踪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非洲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比白人和亚裔更倾向于利用择校的机会。低教育程度的家长也比受过更多教育的家长更喜欢择校的好处。这是因为较富裕的家庭能够通过选择到哪儿居住来择校，此外，他们还可以考虑私立学校。最不能对孩子教育发出声音的群体恐怕是那些教育程度低，经济资源匮乏并且由于人种或种族原因处于不利地位的家长。为这些家庭提供更多跨学区选择的机会将会使他们受益。这些家庭曾一度被认为不关心孩子的教育，因此不会利用择校的机会。然而数据表明，处于不利地位的家庭甚至比更高地位的家庭更善于利用新增加的择校机会。

Harold Alderman等人（2001）用巢式logit回归对巴基斯坦低收入家庭择校行为进行了

研究。研究表明,在该国,即便最贫困的家庭也大量选择私立学校,并且选择私立学校的人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降低私立学校的费用、缩短上学距离以及提高教学质量都可以增加私立学校的入学率。这一方面是因为有更多的学生从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措施吸引了那些原本不打算上学的小孩。对私立学校的大量需求与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相比在数学和语文成绩上的优势是一致的。作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应大力发展私立学校,以便为贫困家庭提供教育服务。

Lee等人(1994)对于学校选择和社会教育分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底特律市45个学区共710个家庭的数据,他们得到的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被调查者更加支持择校。他们认为,由于这类人群通常只能进入低质量的学校,因此促使他们更加赞成择校。尽管如此,作者依然认为择校并非像实证研究表面显示的那样真的会促进教育公平。他们讨论了底特律地区的一项择校计划,指出如果实施这项计划,将进一步加剧底特律地区原本就已高度分化的社会、经济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除了上述两派主要观点,还有一些研究表明不同背景的家庭因择校而受的影响并无显著不同。例如,Hoxby(2000)就公立学校间的竞争是否能够使学生和纳税人受益进行了研究。她的结论是:学区间的蒂伯特(Tiebout Choice)选择是美国公立教育领域最强大的市场力量。蒂伯特选择能够提高公立学校学生的成绩,同时减少学校的花费。家庭拥有越多的蒂伯特选择权,它们就越不爱选择私立学校。尽管学区间的蒂伯特选择使地区间家庭构成的分化加大了,但学区内同质性的增加并没有影响到学生成绩、生均花费以及学校的生产率。对于不同收入和种族的家庭来说,蒂伯特选择的影响并没有显著的不同。

此外,对于不同教育方式间的选择,有Clive R. Belfield(2002)对美国新近兴起的在家就学情况进行的研究。他使用《1999年全国家庭支出调查》和2001年的SAT考试成绩两份大样本数据来评价家庭的入学决定。研究发现,让孩子在家就学的家庭的特征总的来说和选择其它类型学校的家庭特征类似,但母亲的特征——尤其是她的就业状况——对是否选择在家就学有显著影响。不仅如此,各种类型的宗教信仰对就学选择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在Goldring和Shapira(1993)共同进行的研究中,他们检验了家长的满意程度和公立学校择校的相互关系。通过对以色列择校情况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是理解家长满意程度和择校间关系的主要指标。家长是否认为学校的课程与他们的期望相同将极大地影响他们的满意程度。如果家长能有机会参与学校决策,那么他们的满意程度也会大大增加。许多家长并不认为择校是他们唯一能够影响孩子教育的方式,相反,在他们做出择校决定之后,会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入到对孩子的教育中去。择校本身未必能够增加家长对学校的满意程度,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长越是希望能够参与学校决策。

对于家长偏好的研究表明,家长择校时未必以学校的教学质量为标准,而可能看重诸如课余活动、日间照料等条件。研究者指出,低收入的家长更可能受到信息不完全、自身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为孩子择校时较多地看重教学质量以外的标准。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在择校时偏好的不同有可能加剧阶层的分化。Gregory Elacqua等人(2005)对智利的研究表明,尽管在问卷中绝大部分家长都将学校的学术表现作为择校时的重要考虑因素,他们实际的择校决定其实更容易受学校的人口构成等因素的影响,而非学校的学术表现。

总而言之,已有的研究尚未对从择校中受益的是什么样的家庭,以及家庭在进行教育选择时考虑的因素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大部分研究认为择校能够提高学校的生产率,同时家长也能够通过为自己的小孩选择更好的学校提高小孩的学业成绩,但对于择校对社会公平的影响,则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择校并不会对社会公平产生太大的影响,而有的研究则指出一些择校机会会加大社会的不公。

此外,以往对家庭择校行为的研究或分析了家长的择校的偏好,或分析了与择校有关的家庭的背景,但是都没有完整地说明整个择校行为产生的具体过程。家长进行择校,不光要

有择校的意愿，还要有择校的能力。因此择校决策并非简单的“是或否”的判断。

第三，家庭在进行学校选择时可能出于不同的动机，但最终都体现为进行选择的行为。本章所关注的，正是在有择校机会时，家庭如何进行择校决策，以及最终什么样的家庭会采取择校行为，行为本身正是对动机最诚实的回答。在制定教育政策时，针对行为也远比针对动机更具可操作性。

最后，许多国外的研究并没有基于我国的现实环境。由于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差别，影响我国家庭择校行为的因素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章我们将对影响我国家庭择校行为的因素进行探讨，期待发现择校家庭的决策模式及相关特征。

第五节 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设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1）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2）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3）社会资本，它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这三种资本的组合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场域中的位置。

在面临教育选择的时候，人们的行为也受到这三种资本的制约。一个择校行为的产生，首先需要家长有择校的意愿。这种意愿直接来自于选择目标学校比对口学校能够给家长多增加的效用。更本质的是，家长对孩子教育问题的认识往往取决于家长以往所受的教育，也就是家长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家长拥有的文化资本越丰富，才越能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想成功择校，还需要家长有择校的能力。择校需要付出财产，在一些情况下还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同时孩子的学业成绩也至关重要。财产即是经济资本，社会关系即是社会资本，而孩子的学业成绩是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通过描绘拥有不同资本家庭的关系，我们可以了解不同家庭在择校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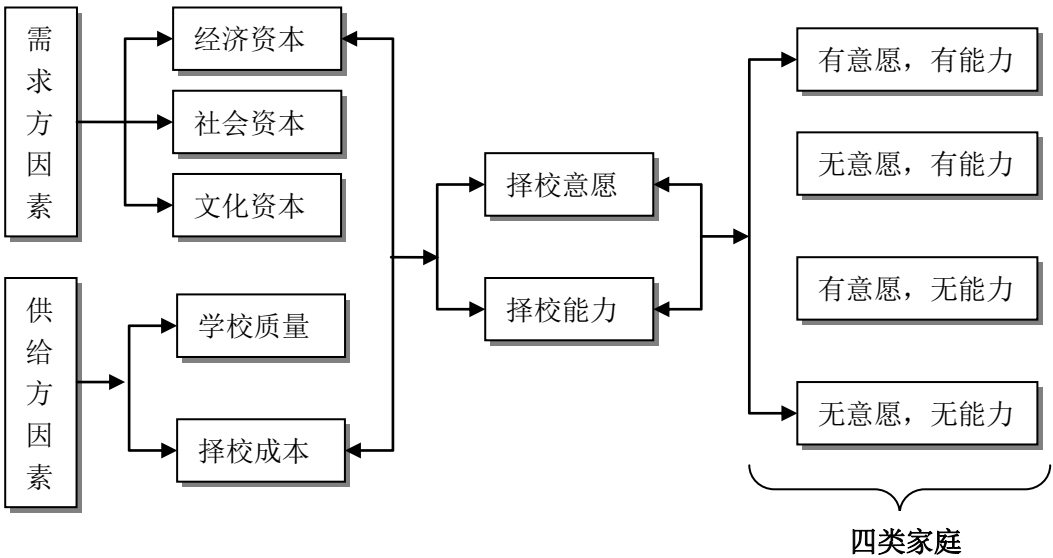


图 1：影响家庭择校行为的需求和供给因素

如图所示，面临学校选择的所有家庭可以分为四类：1、有择校能力且有择校意愿的家庭；2、有择校能力但缺乏择校意愿的家庭；3、缺乏择校能力但有择校意愿的家庭；4、缺乏择校能力且缺乏择校意愿的家庭。家庭本身的择校能力和意愿由三种资本共同决定。与此同时，家庭是否择校还取决于供给方的因素。供给方因素可以归为学校质量和择校成本两方面。目标学校和对口学校的质量差别越大，家庭的择校意愿越强；择校成本越低，家庭的相对择校能力也越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家庭是否会做出择校的行为。

假设1：其它条件不变，家庭利用择校机会的倾向随着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先逐渐变强然后逐渐减弱。

家庭的经济资本主要由家庭年收入及拥有的各类资产数量来衡量。财产较少的家庭可能无法支付择校所需的成本，这些成本不仅包括择校费，也包括因为上学距离原因而造成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住宿成本等，因此这些家庭即便有择校的想法也难以实现。相反，经济资本丰富的家庭能够负担高昂的择校费，在学校距离较远时也能选择较好的交通工具或让孩子住校。因此，在面临择校机会时，经济资本越丰富的家庭越有能力利用这样的机会。但是，对于那些经济资本极为丰富的家庭来说，他们可以通过购买学校周围的房屋，将户口直接迁移到心仪的公立学校附近，以便自动获得上该校的权利（Lee, Croninger和Smith, 1994；Schneider, Schiller和Coleman, 1996；方长春，2005）。对于他们，缴纳择校费为孩子选择学校已经没有必要。

假设2：其它条件不变，家庭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则越倾向于利用择校机会。

家庭的社会资本与家长和其亲属所从事的职业以及所拥有的职务有密切关系，这些资本通常意味着某些可以降低择校成本的人际关系。在一些情况下，如果不拥有社会资本，择校的成本可能是无穷大。在更多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可以和经济资本相互转化。如何运用取决于家长对两种资本边际收益的权衡。

假设3：其它条件不变，家庭的文化资本越丰富，则越倾向于利用择校机会。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通常越能体会到教育所能带来的好处，因此会越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他们会积极去获取不同学校的信息，并愿意为择校付出更多的成本。而对于没有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来说，他们很可能难以意识到孩子教育的重要性，因而缺乏对教育的关注。即便他们有进行教育选择的意识，也很可能不知道该从哪儿获取信息以及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例如，对上海家长的调查表明，没有择校而直接就近入学的比率，随家长文化程度提升而下降（上海教育信息调查队，2005）。

此外，学校通常愿意吸收成绩优异的孩子，并且愿意为此减免择校费。孩子的成绩越好，择校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少。影响孩子成绩的，固然与他们自身的努力程度分不开，家庭文化资本的传承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来自拥有丰富文化资本家庭的孩子通常成绩较好，因此择校的成本会较低，相应地家庭利用择校机会的倾向也会较高。

假设4：择校与择教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择校并非进行教育选择的唯一方式，家长还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对孩子进行教育投入。这些教育投资方式包括聘请家教、参加补习班、进入学校的重点班等，本文中统称为“择教”。家教、补习班不属于正规学校教育，是对正规学校教育的补充，而进入重点班则相当于在学校内部“择班”，这些选择都可以满足家长及其子女对教育的差异需求。与择校相比，择教的一次性投入较少，且当教学效果不满意时可以自由决定转换或中止。但另一方面，系统的教育通常只有正规学校能够提供，家教或补习班不能完全代替。如果家长以孩子人力资本最大化为目标，那么他们会比较择校投资与择教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选择边际收益率较高的方式进行教育投资。在家庭教育预算不变的情况下，当家长认为择教的边际收益率高于择校时，他们就可能放弃择校机会，转而择教。

第六节 数据、变量及模型

（一）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课题组委托国家统计局城市经济调查队完成的《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¹数据。该调查从2005年4月开始进行，调查内容为2004年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采用入户访问方式进行，在全国12个城市共获取有效样本量10009个。该调查分为四个部分：（I）家庭基本情况；（II）家庭成员及不同户父母基本情况；（III）成员受教育情况；（IV）本人及配偶工作经历。本研究选取了其中处于义务教育且就读于国内公立学校的在校生数据，共计2748个案例，每户家庭仅对应1个孩子进行研究。

（二）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本文将用家庭采取择校行为的概率 p 构建方程左边的logit函数，并将该函数作为回归的因变量， $\text{logit } p = \ln \frac{p}{1-p}$ 。在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到：“孩子所就读的学校如何选择的？”该问题一共有五个选项，分别是：1、就近入学；2、电脑派位；3、择校；4、借读；5、其它。本文仅将选择“3、择校”的家庭视为研究对象。借读虽然从广义上讲也是择校的一种，但如本章第二节所述，借读的产生原因、进行方式以及面临的政策环境都和本文所试图研究的择校现象不同，由此导致选择“4、借读”的家庭的特征有可能和选择“3、择校”的家庭的特征有较大差别。因此，我们不将选择“4、借读”的家庭作为择校家庭。 p 是假设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下挑 n 户条件完全相同的家庭，发现其有择校行为的家庭的频数，我们用此频数近似地代替家庭择校的频率。

2. 自变量

本文借助布尔迪厄“资本”的概念框架来组织家庭的背景变量，将背景变量分为三组：经济资本变量组（Ei）、社会资本变量组（Si）和文化资本变量组（Ci）。其中，经济资本变量组包括：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资本品总值、家庭是否有私有汽车3个变量。社会资本变量组涉及父母是否国家干部，父母是否中共党员，亲友中是否有国家干部，父母年龄4个方面共计13个变量。文化资本变量组涉及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孩子的学习成绩两个方面，共用8个虚拟变量和1个定序变量进行衡量。

同时，我们还加入择校成本组（Fi）（包括学校距离和年均择校费两个变量）、学校质量（Q）、每周择教支出（H）作为供给变量。此外，又加入孩子性别、学校层级、省别三个控制变量以观察其余因素对家庭择校倾向的影响。最后，为研究在不同决策阶段影响家庭决策的因素，加入了区分家庭是否对对口学校满意的模型分组变量。

（三）家庭择校的两步决策模型

分析家庭在择校时的决策可以分为两步进行：首先，判断家庭是否认为值得择校，即家庭是否有择校意愿；然后，在家庭有择校意愿的前提下，看其能否在各种条件的约束下实现这个愿望。家庭择校的决策过程可以由下图表示：

¹ 该数据英文名为：Chinese Urban Household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Survey-2004，简称：CHUHEES-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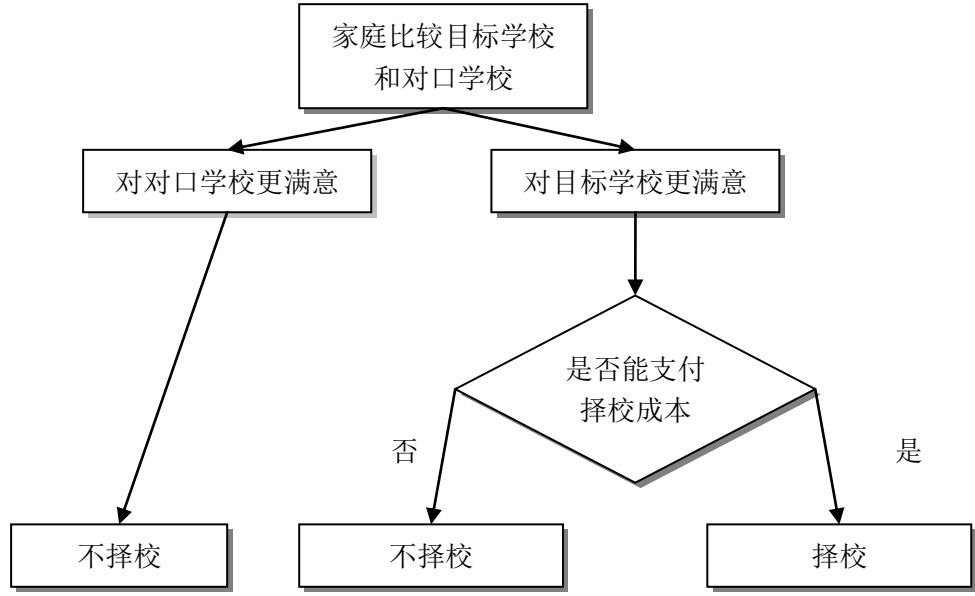


图 2：家庭择校的决策过程

设家长的效用函数为 $U(Y, H)$ ，其中 Y 为家庭三种资本总量， $H=H(Q)$ 是孩子的人力资本函数，该函数是孩子就读学校质量 Q 的增函数， U 是 Y 、 H 的增函数。当孩子就读对口学校时， $U_0 = U_0(Y, H(Q_0))$ ；当孩子择校时， $U_1 = U_1(Y - F, H(Q_1))$ ，其中 F 是择校需消耗的资本。

只有当 $U_1 - U_0 > 0$ 时，家庭才会考虑择校。

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对家庭对对口学校感到不满意的概率 P_1 进

行回归。根据公式 $\text{logit } p = \ln \frac{p}{1-p}$ ，可以得到：

$$P_1(\text{不满意}) = \frac{\exp(\sum \beta X)}{1 + \exp(\sum \beta X)} \quad (1)$$

其中 X 是各种影响家庭对对口学校评价的因素。然后，对有择校意愿的家庭实际择校的概率进行回归，得到

$$P_2(\text{择校} | P_1) = \frac{\exp(\sum \delta Y)}{1 + \exp(\sum \delta Y)} \quad (2)$$

其中 Y 是各种影响家庭择校能力的因素。由（1）式和（2）式可得到家庭择校的总概率：

$$\begin{aligned}
P_3(\text{择校}) &= P_2 \cdot P_1 \\
&= \frac{\exp(\sum \partial Y)}{1 + \exp(\sum \partial Y)} \cdot \frac{\exp(\sum \beta X)}{1 + \exp(\sum \beta X)} \\
&= \frac{\exp(\sum \partial Y + \sum \beta X)}{1 + \exp(\sum \beta X) + \exp(\sum \partial Y) + \exp(\sum \partial Y + \sum \beta X)}
\end{aligned} \tag{3}$$

将前节所述背景变量、供给变量、控制变量放入logistic回归方程右边，我们期望通过得出各因素对家庭择校行为发生比的影响来检验研究假设是否正确。回归方程如式（4）所示：

$$\begin{aligned}
\text{logit } p_i &= \ln \frac{p_i}{1 - p_i} \\
&= z + \sum_{i=1}^3 \alpha_i E_i + \sum_{i=1}^{13} \beta_i S_i + \sum_{i=1}^9 \lambda_i C_{ii} + \sum_{i=1}^{11} \delta_i \text{Region} + \gamma_1 Q + \gamma_2 H + \gamma_3 F_1 + \gamma_4 \text{Gender} + \varepsilon
\end{aligned} \tag{4}$$

其中， $i=1, 2, 3$ ， z 为截距项， ε 为残差项， α 、 β 、 λ 、 δ 和 γ 分别为各项的回归系数。其余变量的含义前面已经进行了解释。

第七节 发现与分析

（一）义务教育阶段倾向于择校的家庭特征分析

1. 模型结果

按是否择校，以及对现在所就读的学校是否满意为标准，我们可以参照前面理论框架的分类将所有2748户家庭分为三类：1、没有择校并且对现在就读学校满意的家庭属于有择校能力但缺乏择校意愿的家庭或缺乏择校能力且缺乏择校意愿的家庭；2、所有采取了择校行为的家庭，不论其对目前学校是否满意，都属于有择校能力且有择校意愿的家庭；3、没有择校但对现在就读学校感到不满的家庭属于缺乏择校能力但有择校意愿的家庭。由于缺乏择校意愿的家庭在第一步决策时即会中止行动，所以实际无法观察到他们是否真的有择校能力。本文关注的是最终采取择校行为的家庭的特征，因此尽管这一分类与图1的分类略有不同，但仍然是可行的。此外，第二类并上第三类家庭即是所有对对口学校不满意的家庭，第一类家庭是所有对对口学校满意的家庭。

将前述变量放入logistic模型，按公式（4），分别用三种模型对 $\ln \frac{p_i}{1 - p_i}$ 进行回归。其中模型一的因变量为“家庭是否对对口学校感到满意”，满意时取1，不满意时取0，家庭感到满意的概率即前文所述的 P_1 。模型二的因变量为“家庭对对口学校不满意时是否择校”，择校时取1，不择校时取0，家庭感到不满意时择校的概率即前文所述的 P_2 。模型三的因变

量为“家庭是否择校”，择校时取1，不择校时取0，家庭在所有情况下择校的概率即前文所述的 P_3 。得到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对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择校倾向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一：不满意倾向		模型二：不满并择校倾向		模型三：整体择校倾向	
	系数	Exp(B)	系数	Exp(B)	系数	Exp(B)
家庭人均年收入	0.819***	2.269	0.216	1.242	0.701***	2.016
家庭人均年收入平方	-0.140***	0.870	-0.036	0.965	-0.116**	0.891
孩子学习成绩	0.212***	1.236	-0.141	0.868	0.198***	1.219
学校距离	无	无	0.106**	1.112	0.180***	1.197
就读学校质量	无	无	-1.889***	0.151	-0.644***	0.525
父亲是否国家干部	-0.279	0.757	1.761	5.820	-0.055	0.946
母亲是否国家干部	-0.094	0.910	-0.277	0.758	-0.253	0.776
父亲是否党员	-0.025	0.975	0.023	1.023	0.028	1.029
母亲是否党员	-0.072	0.931	-0.147	0.863	-0.139	0.871
亲友中是否有国家干部	-0.020	0.980	-0.697*	0.498	-0.210	0.811
父亲年龄为25~34岁	0.081	1.085	0.691	1.995	-0.009	0.991
父亲年龄为41~45岁	0.050	1.052	-0.184	0.832	-0.024	0.976
父亲年龄为46~50岁	-0.083	0.920	-0.829	0.436	-0.260	0.771
父亲年龄大于50岁	-0.345	0.708	0.881	2.414	-0.133	0.876
母亲年龄为25~34岁	-0.078	0.925	-0.114	0.892	-0.048	0.953
母亲年龄为41~45岁	-0.001	0.999	-0.385	0.681	-0.039	0.962
母亲年龄为46~50岁	-0.031	0.969	-0.468	0.626	0.116	1.123
母亲年龄大于50岁	0.271	1.311	-0.799	0.450	-0.097	0.907
父亲受小学及以下程度教育	0.348	1.417	0.338	1.402	0.046	1.047
父亲受高中教育	-0.013	0.987	0.469*	1.598	0.120	1.128
父亲受大专教育	0.029	1.029	0.206	1.228	0.124	1.132
父亲受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	-0.066	0.936	0.592	1.808	0.087	1.091
母亲受小学及以下程度教育	0.102	1.108	0.684	1.981	0.448	1.565
母亲受高中教育	0.203*	1.225	0.555*	1.742	0.352**	1.422
母亲受大专教育	0.456***	1.577	0.331	1.392	0.537***	1.710
母亲受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	0.444**	1.559	0.792	2.207	0.537**	1.711
北京	-0.363	0.695	-0.326	0.722	-0.546*	0.579
山西	-0.261	0.770	0.409	1.505	0.001	1.001
辽宁	-0.504**	0.604	0.054	1.055	-0.380	0.684
黑龙江	-0.422**	0.656	-0.256	0.774	-0.375	0.687
浙江	-0.649**	0.523	0.782	2.187	-0.323	0.724
安徽	-0.488**	0.614	-0.223	0.800	-0.508**	0.602

湖北	-0.147	0.863	0.405	1.500	-0.095	0.910
广东	-0.974***	0.378	0.387	1.473	-0.960***	0.383
四川	-0.234	0.792	0.526	1.691	-0.099	0.906
陕西	0.157	1.171	0.656	1.927	0.284	1.329
贵州	-0.380*	0.684	0.619	1.858	-0.250	0.779
孩子性别	0.037	1.037	-0.219	0.804	-0.085	0.919
孩子正接受初中教育	0.367***	1.444	0.899***	2.457	0.401***	1.493
常数项	-1.874***	0.153	4.598***	99.328	-1.395***	0.248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p < 0.1$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p < 0.05$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p < 0.01$

2. 解释及分析

(1) 从模型三的结果可以看出，家庭的择校倾向随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在收入达到某一极值点后，择校倾向会转而减小。这表明在家庭择校的决策过程中，假设1成立。家庭人均年收入 (E_1) 的回归系数是0.701，Exp(B)值为2.016，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年收入越多的家庭越倾向于对对口学校感到不满。人均年收入每增加10000元，家庭对对口学校感到不满的概率与感到满意的概率之比将比原来增加1.016倍。“以钱择校”是择校的主要方式之一。收入较多的家庭较少受到家庭现金流的约束，能够支付高昂的择校费，从而实现其择校的意愿。此外，一般来说，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食物支出在家庭消费中的比例将减小，在边际消费倾向一定的情况下，也使家庭倾向于将更多的钱投入到对子女的教育中，择校就是进行子女教育投入的方式之一。

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平方 (E_1^2) 的回归系数是-0.116，Exp(B)值为0.891，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择校的倾向先增加，在收入达到某一极值点后，此倾向会转而减小。通过模型中 E_1 和 E_1^2 的系数，可以算出达到这一极值点的收入值约为3万元，即家庭人均年收入在超过3万元后，其择校的倾向会下降。对于人均收入非常丰厚的家庭来说，他们可以通过直接购买其满意的学校周围的房产，将户口直接迁到该学校所对应的学区，从而让孩子成为不需择校的对口学生。通常好学校会带动学校周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使房屋价格超过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方长春，2005），从而使得只有富裕的家庭才能采取这样的策略。

(2) 孩子学习成绩在目标学校中的排名越靠后，家庭对对口学校感到不满的倾向越大，其最终择校的可能也越大。模型三中，孩子学习成绩 (C_9) 的回归系数是0.198，Exp(B)值为1.219，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目标学校中其它孩子的成绩相比，孩子的成绩每低一个等级，家庭择校的概率将比原来增加0.219倍。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文化资本越丰富的家庭越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因此会倾向于为孩子选择更有压力的学习环境。

(3) 受高中及高中以上教育的母亲比仅受初中教育的母亲更倾向于为孩子择校。正如本章假设3所说的那样，受过更多教育的母亲会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也更有能力获取更多的信息。在对口学校质量一定的情况下，受过更多教育的母亲会更积极地去搜集其它学校的信息，并且更有可能获取这些信息，从而扩大自己的比较范围，也因此更容易对对口学校感到不满意。这正是文化资本发生作用的方式之一。

(4) 大多数城市家庭的不满意倾向要比甘肃家庭低，北京、安徽和广东家庭的择校倾向也明显比甘肃低。甘肃属于我国西北不发达地区，相应的义务教育建设也较落后，因此，

甘肃家长对学校的不满意程度偏高也在情理之中。

(5) 孩子所受教育的层级越高，家长为孩子择校概率越大。孩子受初中教育的家长为孩子择校的的概率比孩子受小学教育的家长高0.493倍。这一发现与李忠和乔云桥（2002）对上海浦东新区的研究结果不同。这表明随着孩子就学层次的提高，家庭择校并未如李忠和乔云桥说的那样受到更多限制，相反，择校的限制可能减少了。

(6) 学校距离（ F_1 ）越远和就读学校质量（ Q ）越高，家庭曾经择校的概率就越大。这是因为：首先，对口学校通常距离家庭最近，因此家庭进行择校后，孩子往往要到离家更远的地方上学。其次，在模型二中，就读学校质量（ Q ）越高，家庭是择校家庭的可能性越高，这也是择校造成的结果。目标学校质量与对口学校质量之差是使家长产生择校意愿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原因只在家庭做第一步决策时有效²。当家庭下定决心择校后， Q 的变化就只能作为择校行动的结果了。

反过来想一想，在做第一步决策时，处于不同外部环境下的家庭将拥有不同的择校倾向。对于走读生，在普通交通工具所能覆盖的范围内如果没有质量令家长满意的学校，家庭很可能不会进行择校；如果学校提供住宿且家长愿意让孩子住读，那么学校距离可能就变为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在外部环境因素中，所在学校的质量可能会成为家长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禁止学校提供住宿或者消除地区内学校质量的差别都有可能减少择校的需求。

（二）择校与择教的关系³

1. 模型结果

计算年均择校费（ $F_{1.1}$ ）与每周择教支出（ H ）的相关关系，得到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2：择校费与择教费的相关系数

		择 校 费	择 教 费
择 校 费	皮尔逊相关 系数	1	-0.018
	双尾显著性	.	0.789
	样本量	54	22
		1	0

计算结果表明，年均择校费（ $F_{1.1}$ ）与每周择教支出（ H ）之间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仅仅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并不足以否认假设4的成立。从前面的初步统计描述我们可以看

² 由于没有对口学校质量的数据，评价家庭第一步决策时单独看目前就读学校的质量没有意义，所以本文没有在模型一中放入就读学校质量（ Q ）这个变量。
³ 感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文东茅教授对本小节的有益提示。

到，每周择教支出最多的反而是那些择校的家庭，似乎择教费与择校费之间非但不存在替代关系，反而是互补关系。考虑到择教费与择校费都是家庭总教育支出的一部分，家庭总教育支出中的其它教育支出变化可能带来收入效应，使择教、择校两类费用同时朝相同方向变化，因此引入新变量：年其它教育支出（ $TOEC$ ）（单位：元），以此衡量家庭全年除择教与择校费外为孩子支付的所有其它教育投入。要揭示年均择校费（ $F_{1.1}$ ）与每周择教支出（ H ）的真实关系，需要保持年其它教育支出（ $TOEC$ ）不变。按普通最小二乘法，有如下回归公式：

$$H = \beta_0 + \beta_1 F_{1.1} + \beta_2 TOEC + \varepsilon \tag{6}$$

其中， β_i 是回归系数， ε 是残差。

按公式（6）对三个变量做线性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10所示：

表 3：年均择校费与年其它教育支出对每周择教支出回归的结果

自变量	回归 系数	t检 验值	显著 水平
年均择校费（ $F_{1.1}$ ）	-179 .045	-2. 767	0.00 6
年其它教育支出 （ $TOEC$ ）	0.01 1	3.8 71	0.00 0
常数项	50.6 08	2.0 11	0.04 6

注：1. 因变量为“每周择教支出（ H ）”。2. R^2 =0.065

2. 解释及分析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对年其它教育支出（ $TOEC$ ）进行了控制之后，年均择校费（ $F_{1.1}$ ）与每周择教支出（ H ）的替代关系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年均择校费每上升10000元，每周择教支出就会下降约179元，假设4成立。

第八节 结论、政策建议与不足

家庭的择校倾向可以用布尔迪厄所说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进行估计。在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会对家庭的择校倾向发挥显著影响。在所有家庭中，家庭人均收入较高，孩子相对成绩较差，母亲的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家庭最倾向于利用择校机会。义务教育阶段家庭人均收入的变化对家庭择校倾向影响的幅度很大，并且，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家庭择校倾向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随着孩子受教育层次的提高，家

庭的择校倾向也越大。在外部环境方面,家庭和学校的距离越大以及就读学校的质量越好都更可能意味着该家庭是择校家庭。广东省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倾向是最小的。

与本文的假设相同,研究结果表明择校花费与择教花费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这表明当其它教育支出一定时,择校家庭很可能会以削减其择教花费为代价。从另一个角度讲,那些不喜欢额外送孩子参加辅导班或聘请家教的家庭更愿意为孩子选择一所好学校。

在Barbara Schneider等人对1988年美国国家教育跟踪数据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少数族裔和低教育阶层的人们更倾向于利用择校机会。与他们的研究不同,我们发现,在中国,更能从择校机会中受益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比较丰富的人群。政府如果采取限制择校机会的政策,直接受损的将会是这部分人群。但这并不意味着低收入和低社会地位阶层的人不能从扩大的学校选择中受益,也不意味着限制择校将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处境。恰恰相反,本研究表明,在义务教育阶段,由于政策对择校的禁令,反而使得高收入阶层比低收入阶层更容易利用择校的机会。我们认为有必要修改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择校行为的现行政策,使事实上在义务教育阶段大量地下进行的择校行为能够采取合法的方式。这不仅有助于维护国家政策法规的严肃性,也将给予低收入阶层更多教育选择的机会,真正有利于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

本研究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衡量社会资本的变量及方法稍显简单,因而可能低估了社会资本的作用。社会资本包含了很复杂的因素,其发生作用的方式也很复杂,仅用几个简单的变量很难描述清楚。在进一步研究中,应该采用更加有效的变量和模型来描述社会资本。

(3)、由于所采用的数据仅是对城镇居民的调查,因而对学校方面的分析较为匮乏。择校一方面是家庭的行为,另一方面对学校来说,也是“择生”的行为。增加对学校方面的分析,才能更全面说明“择校”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

参考文献

- [1] Barbara Schneider; Kathryn S. Schiller; James S. Coleman. 1996. "PUBLIC SCHOOL CHOICE: SOME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 OF 1988."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8(1): 19-29.
- [2] Caroline M. Hoxby. 2000. "DOES COMPETITION AMONG PUBLIC SCHOOLS BENEFIT STUDENTS AND TAXPAYER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5): 1209-1238.
- [3] Caroline M. Hoxby.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SCHOOL CHOICE." www.harvard.edu.
- [4] Chang-Tai Hsieh, Miguel Urquiola. "WHEN SCHOOLS COMPETE, HOW DO THEY COMPETE? AN ASSESSMENT OF CHILE'S NATIONWIDE SCHOOL VOUCHER PROGRAM." Working Paper 10008, <http://www.nber.org/papers/w1000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5] Clive R. Belfield. 2002. "MODELING SCHOOL CHOICE: A COMPARISON OF PUBLIC, PRIVATE-INDEPENDENT, PRIVATE-RELIGIOUS AND HOME-SCHOOLED STUDENTS."

Occasional Paper No. 49,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rivatization in Education.

[6] Dennis Epple; Richard E. Romano. 1998 "COMPETITION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SCHOOLS, VOUCHERS, AND PEER-GROUP EFFEC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1): 33-62.

[7] Ellen B. Goldring; Rina Shapira. 1993 "CHOICE, EMPOWERMENT, AND INVOLVEMENT: WHAT SATISFIES PARENT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Winter, 15(4): 396-409.

[8] Gregory Elacqua, Escuela de Gobierno, Universidad Adolfo Ibanez. 2005. "SCHOOL CHOICE IN CHILE: AN ANALYSIS OF PARENTAL PREFERENCES AND SEARCH BEHAVIOR." Working Paper.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rivatization in Education.

[9] Harold Alderman; Peter F. Orazem; Elizabeth M. Paterno. 2001. "SCHOOL QUALITY, SCHOOL COST, AND THE PUBLIC/PRIVATE SCHOOL CHOICES OF LOW-INCOME HOUSEHOLDS IN PAKISTAN."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6(2): 304-326.

[10] Mun C. Tsang. 2001. "SCHOOL CHOI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Working Paper.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rivatization in Education.

[11] Valerie E. Lee; Robert G. Groinger; Julia B. Smith. 1994. "PARENTAL CHOICE OF SCHOOL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EDUCATION: THE PARADOX OF DETROIT."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6(4): 434-457.

[12] Vernon C. Pohlmann. 1956. "RELATIONSHIP BETWEEN ABLILIT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OICE OF SECONDARY SCHOO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29(9): 392-397.

[13] 方长春. 家庭背景与教育分流——教育分流过程中的非学业性因素分析[J]. *社会*, 2005, 424: 105-118.

[14] 郭春发. 教育选择权与教育公平[J]. *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 2006, (1): 78-81.

[15] 郭志刚.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 软件应用[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16]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初中毕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EB/OL]. <http://www.moe.edu.cn>.

[17] 杰夫·惠迪等. 教育中的放权与择校: 学校、政府和市场[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01.

[18] Philip Q. Yang, Nihan Kayaardi. 李莉红, 译. 选择非公立学校的决定因素分析[J]. *民办教育研究*, 2005, 4(3): 94-103.

[19] 李守福. 教育选择与选择教育——兼论公立高中是否该收“择校费”[J]. *比较教育研究*, 2003, (12): 70-74.

- [20] 李忠, 乔云桥. 浦东新区中、小、幼学生择校现状和对策[J]. 上海教育科研, 2002, 50-55.
- [21] MARTIN CARNOY 等著. 闵维方等译. 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22] 上海教育信息调查队. 关于上海市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调查报告[R]. 上海教育信息调查队 1 号公告, 2005 年.
- [23] 文东茅. 我国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及其对弱势群体的影响[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6, 4(2): 12-23.
- [24] 曾天山. 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生”现象剖析[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165-166.
- [25] 周大平. 北京“初、高中分离”为何迟缓[J]. 瞭望新闻周刊, 1998, (14): 32-33.